

## 漫话芦田古村

叶龙虎 文/摄

从丰惠进山，蜿蜒百里，就到了四明山深处的芦田古村。巍巍山脉到此呈游龙回首状，芦田就依附于俗称养山的龙头之下。古村东接棠溪，南邻宓家山，西近前岗，北连悬岩，素有“竹木桑茶之饶”，曾经是天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。旧时划分县界，以水脉为依据，芦田属剡溪水系，自古为嵊县所辖。1960年组建“四明山公社”，嵊、余、鄞、奉、虞五县交界处的一些山村，不分水系，都成了四明山公社的生产大队，芦田从此划归余姚。说到古村的渊源，据传是在明朝中叶，嵊州东林的王氏族人，清明时节去上虞上坟，路过此地见“川媚泉香，山厚林茂”，便插芦定宅，以后村内遍布芦竹，从此便有了“芦田”。

走近芦田，三岔路口的中央矗立着一块巨石，上刻“芦田状元村”五个大字，前面是一个称作“桥口水库”的人工湖。站在南岸的山坡北望，只见湖面晶莹清澈，波光粼粼，北岸坡上错落有致的村庄倒映在水中。今天的村庄已经很少见到芦竹了，但有了背山临水的景致，山村便依旧水灵。西边的堤坝连接着南北山坡，山上古树成群，十几棵金钱松、黄檀、枫香都需二三人合围，挂着古树保护牌子。古村海拔600米，村后的后门山，又称状元山，海拔650米。所谓“状元村”，只是一个比喻，因为村中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大学生。

读过胡兰成的《今生今世》的人都知道，文中有几段话都提到了芦田：“下王再进去三十里是芦田村，在山冈上，那里已是四明山，因有竹木桑茶之饶，亦出财主人家，那家与我家倒是亲戚。”提到他20岁时与玉凤的婚事又说“媒人男家的是宓家山可桢娘舅，女家的是芦田少彭表哥。”还说：“宓家山娘舅做媒人传话传得不好，玉凤的父亲又小气，许多误会，后来是得女家媒人芦田王少彭妥结了。少彭出身大家，与男女两造都是亲戚。”胡兰成提到的亲戚家，就是龙头下的大台门，大台门里的王氏兄弟就是胡兰成的表兄。

古宅、古井、古祠堂是古村的一道不褪色的风景。古宅以台门为主，建筑风格几乎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，大多是坐北朝南的正屋加两厢的三合院式，以堂前为中心，东西对称分布，台门前有几级台阶，大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门环。作为一种文化，台门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，每一个台门都有各自的故事，比如大台门里，或许就有过张爱玲的身影。当地的老人王泰赢很留恋地指着大台门左下方的废墟告诉我：“这里本来是我叔祖父少彭、少云的两个台门，规格与大台门一样，都是曾祖父在道光年间建的屋，可惜都坍塌了。”随着岁月更迭、人事变换，村中很多台门



芦田村远景

已经消失了，有的失修倒塌，有的毁于火灾，有的只剩下半倾圮的木架子。当然也有幸存的，除了王少兰的大台门，还有顺昌台门、中央台门、十七间头以及王氏洋房等。

芦田人杰地灵，王氏世代有耕读家风，据当地村民王美峰介绍，清朝曾出过六位举人、贡生。王氏家庙门口的“贡元”、“文元”两块匾额，就是为道光壬寅年岁贡王凤鸣立的。当然，王氏在近代乃至当代也不乏名人。

村口的王氏宗祠，始建于明代，嘉庆年间、民国十五年、2003年多次重修，是芦田的标志性古建筑，目前为余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祠堂坐北朝南，前后两进，东西各有厢楼，大门悬挂“王氏家庙”匾额。前楼五开间，穿斗式梁架；天井有戏台，与正厅用卷棚廊轩连接；正厅是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三开间，正中悬挂“树滋堂”匾额；左壁有一块“齿德兼尊”匾，还是光绪六年老匾；右壁的“一清如水”匾是为王专中妻李氏立的，为嵊县儒学教谕朱为所书。墙脚下还有一块两面刻有“圣旨”、“恩荣”的石构件，应该是当年李氏的贞节坊上的旧物。正厅两侧的石柱镌有楹联，一联是“敬所尊爱所亲胥望能由是路；入则孝出则悌何为不得其门。”规劝族人要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，建立好的教化，宣扬好的风气。另一联是“三槐绵世泽贻厥孙谋；九百树风声绳其祖武。”引用《书·五子之歌》、《诗·大雅·下武》的古训，告诫长辈要为子孙的将来作好安排，子孙也要继承祖辈事业，踏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前进。

有好山就有好水。古井连接着芦田的昨日和今天。古村有很多古井，虽然形态不同，却是那么清冽、甘甜。虽然有了自来水，人们似乎对古井有着深深的眷恋，依然习惯到井边取水、用水。有的井边还有古树遮荫，光影从树叶间漏下，落在井坛浣衣、洗菜的妇女们的背上。这时候木杵声、笑语声伴随着淳朴的乡风，便在井坛弥漫开来。

## 记忆中的树滋堂

宓水旺

说起来，幼年的学校，过年过节做戏的祠堂，现在的“候车室”，我很迟才知道原先的名字叫树滋堂的。虽然老早有人说过芦田的祠堂不叫祠堂，叫滋堂，但任凭有文化的人怎样的解释，许多人（包括我）就是不信，我甚至连祠堂也不愿承认，叫它老学校。明明是读书的地方，怎么能叫祠堂呢？当然老学校的名字也是在村子的东边新造了一个学校才有的名字，反正原先一直是学校，东西厢房，楼上楼下，一年级唱歌，三年级朗读，谁被老师拎起面壁思过，谁今天得到了表扬，到了晚上几乎全村人都知道了。每个台门总是有几个孩子在祠堂里就读，东厢房可以看到西厢房发生的事，西厢房的班级也知道东厢房在上什么课，兄弟姐妹同在一个地方上学，要不明白也是很难的事情。

祠堂在村子的正中央，坐北朝南，有新学校及大操场以前，那里有全村最大的“道地”，做戏，放电影，开大会，可以容纳全村上千号人。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也要在这里完成，一旦有人逝去，就一定要在祠堂的门口“做杠”，然后，绕村一周，才能送达最终的目的地。

其实，我也没有真正在祠堂里读过书，我只是跟在大姐二姐的屁股后面去听老师上课，像我这样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的有很多，老师们也允许我们这些编外的学生存在。那时，多想有一天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呀。可是临到我读书的那一年，本来向往的地方，忽然老师说祠堂里挤不下这么多的学生了，改在大队的办公室旁边的空房里。后来，我们又搬过无数次的上学的地方，就是没有搬进祠堂，直到新学校造好。

祠堂到底有多老，我没有考证过，也许根本无法考证。甚至那“捧旨”建造的传说，我也以为是以讹传讹的事。好在那块“旧石”已经找到，刻着圣旨与恩荣的字迹也赫然在目。若干年前，祠堂门口的道地变成了车站，大门旁边竖起一块石碑，上书“树滋堂”，我才惊讶“传说”的真实和自己的无知。

如今，山里人依旧严守家训，依旧过着质朴平静的生活。芦田人家大都姓王，从严格意义来讲，我并不是正宗的芦田人，父亲只是芦田王氏的女婿。但是，王家大祠堂已经容纳了像我这样的外姓芦田人，无论我漂泊何处，都将传承树滋堂一脉。



芦田村桥口水库

## 网坛风雨路 ——李娜自传

48

那个充满正面能量的李娜又回来了。

打完伯明翰精英赛，我还要去赶在荷兰进行的两站比赛。从伯明翰长途跋涉到荷兰，一路又是飞机又是大巴，折腾得我筋疲力尽。

比赛时间安排得很紧，我上午到荷兰，下午就去训练，因为第二天就要比赛。这次比赛我并不孤独，因为一同赶来参赛的还有中国国家队的队友。比赛当天我打了一局，正当我聚精会神想着怎么把对手的发球局破掉的时候，忽然扭到了脖子！好痛啊！连转头都不能了。我立刻僵在了原地，裁判马上去请赛会医生，在等待医生的时候，我就坐在休息室里上网，队友喊我，我也不可能转转脖子答应，只能以脊椎为轴整个人向队友方向转动，样子相当狼狈。

赛会医生带我去了WTA的医务室，帮我推拿按摩，还贴了膏药，让我好好休息两天。遵医嘱，我整整两天没敢动脖子，但收效甚微。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马上就要开赛了，这可怎么办？

怀着“必死无疑”的心情，我跟国家队的另外几个队

友一起奔赴温网比赛地点。

在温网的场地上训练的时候，我仍然是那个直着脖子的怪样子，我的朋友们都忧心忡忡地为我着急，这时，我们认识了一个在此地留学的中国学生，他在我们比赛的球场里打工，他说自己认识一位中医，可以请中医帮我做个针灸试试看。

那天是星期六，星期一温网就开赛了。

我想，事已至此，看看中医也无妨。这时的我已经做好了时刻回国的准备。

就在这个关头，温网WTA医务室的一位印度医生看到了脖子僵硬的我。我告诉他脖子不舒服，讲了自己受伤的过程。印度医生没有多说，伸手往我脖子上一放，“咔嚓”一掰，脖子竟然神奇地好了！

我又惊又喜，连声道谢，逢人便说WTA的一位印度医生妙手回春，轻轻一掰就把我的脖子治好了。这位医生大概此前已经掰过很多球员了，大家对他的医术都印象颇深，很多运动员一听就知道：“哦！他啊！”然后告诉我他们以前脖子没事的时候找这位医生做过推拿，结果被掰得转不了头。大家都恭喜我，说我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。

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！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温网。事实证明，这次我的运气着实不错。星期一那天，忽然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大雨，温网被迫推迟了一天。我又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。周二比赛，我的首轮对手是一位法国女孩，那次我打得很轻松，很快

## 城东下茅塘

戴勤锋

北宋诗人贺铸曾在《茅塘马上》中写道：“水落陂塘秋日薄，仰眠牛背看青天。”短短十四个字，却生动地描写出了农村那种宁静恬淡的田园风光。记得儿时看到此诗时，误以为写的就是我家世代居住的下茅塘，直到长大了才知道是贺铸任和州（今安徽和县）巡检时所作。说到下茅塘，可能许多“老宁波”还记得，以前东郊路上有上、中、下三个“茅塘”，前两个“茅塘”至今还居住着历史上出过“一门三宰相，四世二封王”的史氏家族；而下茅塘既没出过名人，也没什么古迹，不过是城东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而已。虽说名不见经传，但它从农村到中心城区的变迁历程，却是近年来，宁波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完美的缩影。

下茅塘位于江东中兴路旁，它南依后塘河，北靠宁穿路，关于地名的来历，应与茅姓有关。据《鄞县通志》记载，下茅塘茅姓先祖“明永乐中，自山阴来。祠在张斌桥下东首上茅塘，额署茅氏宗祠”。可见，下茅塘距今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，下茅塘还是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，村子东首的西洞桥是个地标，桥西属于江东，桥东属于鄞县。大家常戏称自己居住的地方是真正的乡下“头”。下茅塘当时有五百多亩耕地，作为宁波市蔬菜一线基地，为丰富市民菜篮子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。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随着城市东扩的脚步慢慢逼近，打桩机“嘭嘭”的声响很快就打破了村庄的宁静，在村民们世代耕作的土地上，一幢幢高大的楼房像庄稼似的拔节而起。此时的下茅塘成了名副其实的都市里的村庄。没过几年，有关部门拆除鸭棚在原址上建起了美丽的樱花公园，浑浊不堪的后塘河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。下茅塘除了老房子还没拆迁，周边的环境变漂亮了，特别是樱花公园的建成，为附近居民提供了很好的休闲场所。

2002年，下茅塘终于要拆迁了，那时我的心情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没拆的时候一直盼望着早点搬走，可真要搬了倒有点舍不得，毕竟这里的每条小巷、每块石板上都留下过我许多美好的记忆。经过三四年的建设，古老的下茅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住宅小区，里面不仅安全整洁，附近还有超市、菜场、社区医院、体育中心等配套设施，居民生活非常便利。居住条件好了，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乱扔垃圾的习惯改了，爱护环境的意识强了；打麻将的人少了，而锻炼身体的人多了。尤其是我家那些上海亲戚，以前来宁波做客时总说我们卫生条件不好，生活质量与上海差很多之类的话。现在到宁波来，看到美丽的城市和整洁的小区，直说宁波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太大。

如今，下茅塘这个地名早已成为了历史，樱花公园地块也即将成为宁波轨道交通最大、最重要的枢纽之一。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我总是感慨不已，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宁波城市面貌日新月异，变化可谓翻天覆地。特别是近几年，随着城市扩建和东部新城的快速发展，下茅塘这个昔日的乡下“头”，变得越来越美丽、越来越繁华了。

**人文** 总第 5614 期 三江月  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就赢了。

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温网是草地比赛，而我从来没有练过草地。参加温网，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气，到温布尔登之前，我还跟队友开玩笑：“我不会打草地。来参加温网就只能拿第一轮的钱，拿完就回家。”

不熟悉草地的原因是国内没有草地和红土这两种场地，我对这两种场地心里都没底。这也是很多其他运动员的软肋。四大公开赛有两项是在硬地上进行的比赛，我们一年中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硬地场地征战。

小时候，我还在武汉的灰色沙地上练习球，对沙地还稍微有点印象，这点印象可以让我在红土地上凑合一下，我会一点点滑步——就像在旱地上滑冰的那种步法，但在草地上打球，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草地比赛，球落地时同场地摩擦小，球的反弹速度快且不规则，因而对于球员的反应、奔跑的方式和技巧要求非常高。人一上草地，重心必须马上降得很低，更不可能滑步，这对许多运动员都是很大的挑战。

从硬地转为红土，我还多少有一点童年留下的经验可供借鉴，而且中间有两三周的时间可以让我练习、适应场地。但从红土转到草地，那种巨大的变化真让人难以招架，每次我一上草地就觉得手足无措，连怎么移动都不知道。而温网能提供给你练习的时间也非常短，我只能边打边适应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丽芬